

张作霖

马玉祥国
民军联军

北京

中国1927 谁主沉浮

叶曙明 著

吴佩孚

孙传芳

芳

广东国民政府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中国1927

谁主沉浮

叶曙明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1927·谁主沉浮 / 叶曙明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0. 11

ISBN 978-7-5360-6120-0

I. ①中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国—现代史—史料—1927 IV. ①K262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9222号

责任编辑：詹秀敏 张 懿

策划编辑：李黎明

装帧设计：蒋宏工作室
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19
字 数	280,000 字
版 次	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，
这是无数十字路口中的一个。

每一个十字路口，
都铺满了头颅与鲜血。

谨以此书献给那些——
因革命之名而牺牲的人们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

要革命,到南方去 / 002

“孤胆英雄”那一套吃不开了 / 013

请神容易送神难 / 017

联俄容共政策的启动 / 021

中共中央遭遇“迫迁” / 029

鲍罗廷携巨资登场 / 035

苏联人让蒋介石去大西北搞农民运动 / 042

今年以内,革命事业彻底大成功 / 046

外蒙问题风云激荡 / 056

法统谢幕,党统登场 / 061

第二章 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

想做华盛顿的商人 / 074

百年繁华一夕成灰烬 / 081

“泥腿子”们站起来 / 086

海丰响起全国第一声雷 / 090

和平、奋斗、救中国 / 095

国民政府开张大吉 / 102

我们工人有力量 / 110

罢工委员会君临天下 / 115

第三章 后孙文时代的来临

人死了，党也分裂了 / 124

西山碧云寺上的哭灵大会 / 129

十年干戈天地老 / 133

暗潮汹涌的“无人地带” / 138

3月20日，两党重新洗牌 / 146

浙江人赶跑广东人 / 156

基督将军也革命 / 165

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/ 170

第四章 革命就是暴动

是防御，还是进攻？ / 176

气势如虹,饮马长江 / 186

鲍罗廷向北,蒋介石向东 / 192

迁都之争是决裂的先声 / 196

罢工造成两败俱伤 / 203

无条件结束省港大罢工 / 208

有土必豪,无绅不劣 / 212

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/ 216

上海已成赤旗飘扬的天下 / 221

第五章 天柱折,地维缺

荆门九派尽赤潮 / 232

汪精卫重返舞台 / 240

血海中的4月 / 249

鲍罗廷的“西北学说” / 257

湖南一夜变天 / 262

失败的革命,亦即新革命的起点 / 273

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/ 286

后 记 / 291

第一章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

要革命,到南方去

“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。”列宁的这句名言,曾经令无数革命者激情澎湃,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去。金戈铁马、流血牺牲,前赴后继,奋斗不息,写下了一页页惊天地、泣鬼神的篇章。

大革命,对于生活在 21 世纪的人来说,已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了。人们几乎已经淡忘,在距今八十多年前,在距离北京三千多公里的中国南部,在南海之滨、五岭之阳的广东,曾经成为一场震撼中国历史的大革命中心。这场革命,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。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,在短短几年时间里,由星星之火,发展成燎原之势,席卷长江以南,波及全国,最终摧毁了北洋官僚集团的统治,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,打破了以往只有北方统一南方,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历史神话。

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,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,但它的影子,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。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,包括社会动员模式、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,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,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,从井冈山到北京城,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,我们都不难找到 1920 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。

这场影响中国几十年的大革命,为什么不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方,不发生在黄土高原,不发生在西方势力强盛的东部沿海,却发生在广东呢?

自古以来广东就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。它的地理特点是对内相对封闭(有五岭阻隔),对外则完全开放,拥有中国最大的一片海洋国土——南

海,有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,从汉代起就是海上丝路的始发地。虽僻在南版,然门户四达。当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大陆农业社会时,广东被视为偏远的蛮荒之地;但当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以后,广东便成为中国面对世界的最前沿了。

历代王朝对广东的控制,本来就有鞭长莫及之感,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之后,国家机器已严重破损失灵,对南方的管治,更趋于松弛。在近代史上,第一波从南向北的革命,是太平天国;第二波,是同盟会的反清革命;第三波,就是1920年代的大革命了。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其发源地都在广东(太平天国虽然起于广西,但一班领袖大多为广东人),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。

中国有句老话:“王气在北方,民气在南方”。早在鸦片战争时,林则徐就觉得广东有一股强悍的“民气”,可与洋人决一雌雄,他向朝廷请战时说:“民气可用。”民气固然可用,却不是人人会用。善用者,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,叫高山低头,河水让路,甚至创造历史、改写历史。

广东离“王气”最远,民气最盛。这恰恰是它成为近代政治文化试验区的最有利条件。从“五四运动”开始,保守主义、自由主义、民主主义、人本主义、安那其主义、民粹主义、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,在北方蓬勃兴起,百家争鸣,处士横议。但要把这些新思想化作改造社会的行动,则广东是一块首选的实验田。孙文搞三民主义要到广东来,陈炯明搞地方自治也要到广东来,共产党搞共产主义革命,也要到广东来。

昔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著名对联:“升官发财请走他路,贪生畏死莫入斯门”,横批“革命者来”。这也是1920年代广东在全国热血青年心中的形象。大批有理想、有智慧、有行动能力的社会精英,便如怒潮排壑一般投奔革命而来了。

1895年,孙文第一次发现日本报纸把他称作革命党时,十分吃惊。他的同伙陈少白说:“做皇帝才革命,我们哪里是革命?我们只是造反罢了。”时间仅仅过去25年,在中国再没有哪个词比“革命”更时髦,更响亮了。

《易经》云:“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据后人解释,“革命”的“革”字,上为“甘”,下为“十”,含有“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”之意;而“命”则代表天命。

中国人用“革命”对应英文的“revolution”，不无道理，在英文中，revolution 既有大变革的意思，亦含有天体循环运行之意。似乎革命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，总是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联系起来，而被赋予“天道”的内涵。

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次改朝换代，但不仅仅是天子易姓，而是以符合天道的“民主共和”，取代无道的“皇权专制”。然二者如何在价值上对接，便成了令人彷徨与头痛的事情。直到“五四运动”，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。皇帝打倒了，传统的伦理道德、纲常秩序、价值信仰，失去了皇权的靠山，便再无往日的法力了。民国第一、二任总统，都是匆匆上台，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。孙文在西南护法，亦复如是，使政治权威的失落，达到崩溃的边缘。

台上幕落暗场，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，而幕前的观众，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，他们发现，这是一出无剧本、无导演、无监制，亦无固定演员的戏。中原逐鹿，捷足先得。于是纷纷登台，各显身手。思想的自由度、学术的自由度，反而空前大增。

知识分子肩负起在传统价值的废墟上，重新建构价值的任务。1915年，陈独秀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（从第二卷起改名为《新青年》），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程炮。《新青年》面世之初，标榜“不谈政治”，以写“两个蝴蝶，双双飞上天”（胡适诗）一类白话诗为时髦，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，而不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。这一时期的陈独秀，也是激情澎湃的启蒙思想家，而非社会革命家。

陈独秀，安徽怀宁人，前清秀才出身。1917年，北大校长蔡元培把陈独秀延揽入校，掌文科学长。新文化运动达至高潮，民主、科学高唱入云，白话文大行其道，掀起文学革命的大潮。

俄国十月革命成功，促使陈独秀迅速向左转。他断定非得以阶级斗争为手段，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改造，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积弊。他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“专谈政治”的《每周评论》，便是改弦易辙的产物。

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，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，一位不遗余力的政治革命“吹鼓手”，与陈独秀并称“南陈北李”，是有名的美男子，生平除了革命，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，一天可以抽上三罐纸烟。1918年底李大钊发表了《庶民的胜利》一文；1919年初又写了为俄国革命欢呼的《Bolshevism的胜利》，热情预

言：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！”^①陈独秀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，受李大钊影响，也许更甚于受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。

那个时代的学者名流，人人奢谈主义，但李大钊是第一个清楚地领悟到“主义”的政治动员作用，也是有意识把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，作为鼓动民众手段的第一人。尽管当初孙文搞同盟会，也提出过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口号，但那只是内部的盟誓，并没有成为社会流行语，威力已相当惊人。李大钊率先喊出了“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”的激烈口号，足以把天掀塌了一半。

新文化的巨匠们，几乎无一不是怀着急切的救世之心，他们引进西方思想，与其说是为了启蒙人心，解放个性，不如说是为了直接利用来改造社会。陈独秀就曾幻想，德先生(Democracy)和赛先生(Science)“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、道德上、学术上、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”。^②

1919年“巴黎和会”上中国外交失败，触发了民族危机，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导的大规模爱国示威运动，迅速波及全国。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。一直为自身缺乏传统文化支撑、处于浮游漂离状态而苦恼的新文化运动，眼前仿佛豁然一亮，他们找到了传统价值的立足点：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。这是团结和动员民众的最有效武器，也是他们转向社会革命的最充分的理由。新文化运动急速地分化了，启蒙思想家们各自在人权与国权、个性自由与国家的强盛之间，作出选择。政治革命的雷声，终于从遥远的地平线隆隆传来。

值此苍黄百变的关头，无法肯定，陈独秀对惨淡经营数年的新文化运动，是否仍有所眷恋，但1919年6月11日，他的生命终于出现突变。这天，他揣着自撰的传单，奔上街头散发，被军警拘捕。这是颇具象征意义的，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激烈的主张：“出研究室进监狱，出监狱进研究室，是学者的任务”。现在变成“上街头进监狱，出监狱上街头”了。陈独秀已经为他过去几年的奋斗，作了一个总结；也为新文化运动作了一个总结。长逾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运动，从这时起拉开了帷幕。

新文化运动，在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，突然向社会改革运动急速转场，政治腐败是内因，民族危机是外因，两者交逼，已到了存亡决于呼吸的程度。加

①《李大钊选集》。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5月版。

②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1号。

之数十年来，附西方文化的骥尾，并没有出现“芝麻开门”的奇迹，渐渐演化成失望和怨愤，遂造成马克思主义振臂一呼，从者如云的大势。

1918年7月25日，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，“凡从前与日本、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，一律取消”；“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，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，一律放弃。”^①

这个宣言的背景，是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，面对协约国军事干涉和白俄兴风作浪，在国际上十分孤立，政权岌岌可危，所以要博取一个同样受帝国主义欺凌的邻国同情。果然，一纸宣言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简直是寒冬里的一把火，把所有人都烧得暖烘烘的。一时间，人人眼中噙泪，攘臂欢呼，亲俄成了知识界的新潮流，大学争相开设俄文班、俄文系；共产主义小组、社会主义研究社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类社团，在大江南北纷纷冒出，形成百川赴海之势。

陈独秀出狱后，带着《新青年》离开了北京，到上海筹组共产党。1920年3月，共产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中国，名叫维经斯基（又译为魏金斯基、威金斯基等，中国名字叫吴廷康），时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，由李大钊介绍，在上海和陈独秀会面，探讨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。

维经斯基还肩负着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。书记处的其中一项工作是：在中国进行共产党的组建工作。陈独秀本来就早有打算，双方一拍即合。5月成立了共产党的临时中央，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。维经斯基做梦也没想到，原以为十分艰难的任务，竟如此轻而易举就完成了。

当时，广东省长、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东推行自治，建设模范省，盛情邀请陈独秀到广东办教育。陈独秀向陈炯明约法三章：一、教育独立，不受行政干涉；二、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；三、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。陈炯明满口应承。1920年12月25日，陈独秀来到了文化界、思想界皆一片死寂的广州。在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之余，还计划在南方筹备组织共产主义组织。

^① 魏宏运主编《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》（一）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1921年2月14日,广东省政府公布由陈独秀主持起草的《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》,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。3月8日,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,政务委员八人,另有若干名事务委员。政务委员中,四人由省长委任,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、各专门学校、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产生。委员长由全会委员互选产生。委员及委员长均任期一年,可以连任,委员长必须兼任大学校长。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(兼大学预科校长),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。

《新青年》杂志也随着陈独秀南迁。4月1日出版了在广州的第一期(即八卷六号)。在《新青年》南迁之前,由陈公博、谭平山、谭植棠等人主编的《广东群报》,是陈独秀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。陈独秀与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论战。陈氏不仅四处演讲,而且在报纸上,连篇累牍,发表言论,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主张,半年内,在《广东群报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民国日报》、《曙光》杂志上,一口气发表了四十多篇尖锐激烈的文章,广东的一潭死水,终于掀起千层巨浪。

从3月中旬开始,一批顽固守旧人士,以陈独秀主张“讨父”、“仇孝”、“公妻”、“妇女国有”为由,呼吁把他逐出广东。上海广肇公所发表讨陈檄文,声称:“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,主张百善以淫为首,万恶以孝为先。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,敢倡此等邪说,留毒社会。贻害青年,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。诸公爱乡念切,谅不坐视。务望主持公论,驱逐枭獍,勿使尔迹吾粤,不胜盼切之至。”他们把陈独秀称为“陈毒兽”。3月16日,陈炯明在报纸上为陈独秀公开辩护:“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,道德高尚。现在改良粤省教育,倚畀方殷。沪报所载,系属谣传,请勿轻信为盼。”^①

陈独秀对谣言倒并不太在意,他的精力,都放在筹建广东共产党的事情上了。3、4月间,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,初由陈独秀任书记,后由谭平山继任。谭植棠任宣传委员,陈公博任组织委员,以《广东群报》为机关报,着手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;通过青年团作外围组织,吸收党员。陈独秀还利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,创办了“宣传员养成所”,以陈公博为所长。

当时,上海的共产党临时中央提出,要么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,要么

^① 香港《华字日报》1921年3月18日。

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。陈独秀反对中央南迁,他说广州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,地理上也不适中,不同意党的机关搬广州。他并提醒大家,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,我们不要第三国际的钱。拿人家的钱,就要跟人家走。到了5月,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渐近,上海方面,频频催促陈氏和广东代表,即赴上海参加中共“一大”。陈独秀遂向陈炯明提出辞呈。陈炯明一再挽留。

6月底,陈炯明出师援桂,不在广州,陈独秀再以“染恙”为由,提出辞职,9月11日离粤返沪。陈炯明在军旅之中,闻讯急电挽留,劝陈独秀:“仍望以教育为重,当风独立,我做我事,不萌退志为要。至于一切障碍,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。”^①同时派人回广州挽留,但可惜,他的代表到达广州时,陈独秀已经在前往香港的轮船上了。

1921年6月,又一位对中国革命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出场了。根据列宁的推荐,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派到中国。当时苏俄已打败了白俄势力,远东共和国也成立了,苏维埃政权在整个远东地区终于站稳了脚跟。这时,苏俄的着眼点,已不再是如何争取中国的同情,而是如何向中国输出革命了。

马林是荷兰人,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。通过维经斯基介绍,他结识了李大钊。李大钊让张国焘陪马林去上海。当时陈独秀不在上海。7月,在马林主持下,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,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,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。缺席的陈独秀当选为党的最高负责人——中央局书记。

马林是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,但他本人却并不看好这个组织,甚至觉得是维经斯基一手搞出来的“早产儿”,本不该这么早降生的。^②他反而更看好孙文的国民党。但也有人认为,把共产党这个“早产儿”催生出来的,其实正是马林自己,而不是维经斯基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即持此种看法,他说:“如果不是他(马林)来,我们党的‘一大’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,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。”^③

这时中共组织还很弱小,只有五六十名党员,大部分是知识分子,而且是

①《广东群报》1921年9月13日。

②《联共(布)、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(1920-1925)》(上)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7年版。

③包惠僧《回忆马林》。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》(增订本),人民出版社,1980年版。

个不能公开活动的秘密政党，国民党则是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党，革命历史悠久，有两广的地盘、近10万军队，而且得到工人和市民的支持——这主要得归功于陈炯明卓有成效的地方自治运动——这些都是中共在短期内难望项背的。

因此，马林瞧不起中共，陈独秀也不喜欢马林。陈独秀甚至不让中共加入第三国际。有一回张太雷在陈独秀面前谈到共产国际，话还没说完，陈独秀就猛拍桌子，大发雷霆：“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，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。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，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。”^①

按张国焘的预算，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，每月大约一千多元，马林答应这笔钱由共产国际出，据包惠僧说，陈独秀坚决不准中共领取共产国际的经费，以免影响中共的独立自主。他要求革命者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，领了钱就等于雇佣革命。

然而，中共是否真的没有从共产国际领钱呢？有一段时间，陈独秀与马林二人频频争吵，竟闹到互不见面。马林怒气冲冲地责备，“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，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”。^②陈独秀反唇相讥：“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？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，如何诬赖别人！”这番对话似乎也证明了，中共并没有拒绝国际的资助。

1921年10月4日，陈独秀、杨明斋、包惠僧等人，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宅里被捕。马林立即展开营救行动，据包惠僧说：“马林使尽了气力，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，承办这个案子。马林花了很多钱，费了很多力，才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。”这并不是马林自己的钱，而是共产国际的经费。这样一来，就算陈独秀真的不想要国际的钱也不行了，而且是用在自己身上。虽然他性格倔强，也无话可说了。出狱后，陈独秀对马林的态度，便完全改变了。

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，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：1、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，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。2、赤色职

^① 包惠僧《回忆马林》。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》（增订本），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版。

^② 《周佛海回忆录》，台湾，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88年版。

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,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,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。3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,如有必要的开支,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。^①

这种戏剧性的转变,以后几年里,在陈独秀身上,还发生过好几次。

根据陈、马达成的协议,名义上,中共还是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金钱,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赤色职工国际、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一个圈而已。1922年6月,在陈独秀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,列明中共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的收入与开支情况,其中收入部分,自行募捐1000元,国际协款为16655元。^②到1923年召开中共三大时,连赤色职工国际的圈也不再绕了,中共的经费,几乎全部直接来自共产国际。陈独秀在三大上说:“今年(1923年6月之前)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.5万,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。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,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,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。”^③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共产党成立,一转眼就五个月了,似乎没有什么大动作,与其说是一个革命党,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学术团体。马林静极思动,想到南方实地视察一番。于是,在翻译张太雷陪同下,化名“西蒙博士”,风尘仆仆,赶到两广,分别拜会护法政府非常大总统孙文和省长陈炯明。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北伐,热闹的政治气氛,令马林眼前一亮。

马林在桂林和孙文两度晤谈,建议国民党在与苏俄合作的前提下,“一、改组国民党,与社会各阶层,尤其与农民、劳工大众联合;二、创办军官学校,建立革命军的基础;三、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。”^④

孙文,广东香山县人,生于1866年,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,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党领袖,自称“生平酷爱革命”,不仅要用革命来创造国家,还要

①包惠僧《回忆马林》。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》(增订本),人民出版社,1980年版。

②《共产国际、联共(布)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(1917-1925)》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8年版。

③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》(一),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1982年版。

④《孙中山与马林会谈纪要》。《黄埔军校史料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82年版。